



小说《青春之歌》评析

XIAO SHUO QING CHUN ZHI GE PING XI

上海教育出版社

I207.4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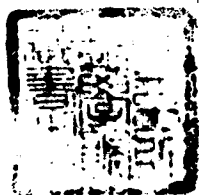
小说《青春之歌》评析

王永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0563



上海教育出版社

770563

小说《青春之歌》评析

王永生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字数 82,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本

统一书号: 7150·2263 定价: 0.28元

D = 98/12

目 录

一	三十年代爱国学生运动的真实写照·····	1
	从文艺作品帮助人们认识过去谈起·····	1
	从一定的历史范围看小说反映的生活·····	8
二	女主人公林道静在斗争中茁壮成长·····	14
	林道静的坎坷境遇与曲折生活道路·····	14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健康地逐步成长·····	20
	林道静形象塑造的成就及其重大意义·····	27
三	坚强的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林红·····	35
	爽朗热情、坚贞不屈的卢嘉川·····	35
	稳健沉着、机智勇敢的江华·····	42
	关怀战友、视死如归的林红·····	47
	扩大视野，为塑造英雄形象艰苦劳动·····	50
四	走着不同道路的三十年代知识青年·····	54
	积极向上的徐辉、罗大方、许宁·····	55
	年轻姑娘崔秀玉和俞淑秀的成长·····	60
	侯瑞的进步与王晓燕、李槐英的觉醒·····	63
	余永泽、白莉苹等人的沉沦、堕落·····	68
	从生活出发，塑造众多的青年群象·····	73
五	形形色色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78
	刘亦丰和一批工农基本群众形象·····	78
	余敬唐、王彦文和乡村小学的教员们·····	85

王鸿宾教授在现实斗争中的可喜转变·····	87
戴愉、胡梦安等反面形象的塑造·····	90
六 小说的思想成就与艺术特色·····	99
作品的思想意义与作者的创作准备·····	99
观察的细密与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	103
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107
情节结构安排着眼于刻画主人公成长·····	113
小说的缺点与不足·····	117
后 记·····	119

一 三十年代爱国学生运动的真实写照

从文艺作品帮助人们认识过去谈起

一切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文艺作品，都能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本质。尽管作品所再现的生活与斗争离开我们读者有了一些年月，由于作者历史地具体地展示了当时的生活与斗争的面貌，形象地生动地刻画了特定历史时期风云变幻中的各种人物，对于我们读者认识历史，认识我们的祖辈和父兄们如何斗争过来的道路，从而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一样，都努力使自己的工作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过去，切实地从中汲取历史教益，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贡献毕生的一切。但两者在帮助人们认识过去的方法、手段、途径等方面却互有不同。史学工作者从大量的史料中进行分析、综合，总结出某一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找寻出各种各样的规律，以条理分明的论述向人们进行介绍。文学工作者也不断地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中认清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学工作者不是抽象地，而是栩栩如生地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再现于人们眼前。史学工作者与文学工作者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例如关于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固然很希望史学工作者以简明扼要的历史论著，介绍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如何践踏我国的神圣领土，如何残暴杀害我无辜同胞，蒋介石国民政府如何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血腥镇压广大坚决要求抗敌御侮的爱国军民，亿万中华儿女如何奋起抗争，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救亡行列的斗争事迹；他们也热切期望文学工作者，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从某一侧面，将这个大动荡年代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鲜明生动地展示出来，让相隔四五十年的“后来人”，形象地看到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各种觉悟水平、各种思想状态的人们，怎么想，怎么做，劳动人民怎么受苦遭难，先进的人们怎么前仆后继地投入战斗等等的情况，从而受到激励、鼓舞和教育。

杨沫同志描述从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九五八年初次出版后，之所以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正是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在这一定历史阶段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斗争，表现了三十年代我国知识青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成长过程，适应了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形象地认识过去，更好地投身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巨大胜利的强烈愿望。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尽管这部小说被禁锢了多年，但就在“四人帮”为非作歹的年月里，依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争相传阅。

小说主要围绕知识青年林道静在斗争中逐步成长的过程展开情节，精心刻画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卢嘉川（冯

森)、江华(李孟瑜)、林红(郑瑾),以及刘亦丰、徐辉等较为成熟的共产党人形象,具体细致地表现了他们在斗争中对林道静的教育帮助和战友间的革命影响。同时,小说也着力塑造了“姑母”、任玉桂父子、郑德富、许满屯、陈大娘等一批勤劳质朴、苦大仇深、悉心关怀知识青年成长的工农形象,并成功地描绘了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风暴中起伏浮沉的形形色色知识青年,如罗大方、许宁、侯瑞、崔秀玉、俞淑秀、王晓燕、李槐英,以及余永泽、白莉苹、陈蔚如、林道风等人的思想言行,爱憎分明地表现了在历史大动荡年月,多数知识青年在党的影响教育下迈开前进步伐,或稍有曲折、迟疑,最终仍走向革命,少数人则沉沦堕落,成为怯弱庸俗的时代渣滓的过程,形象地揭示了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历史搏斗中,知识分子倘不接受党的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终将一事无成的革命真理。作者笔下那个窃取区委书记要职的机会主义分子、最终沦为叛徒特务的戴愉,奸刁狡黠的反革命分子胡梦安,心狠手辣的地主分子宋贵堂、宋郁彬,老于世故的乡村小学校长余敬唐、王彦文,以及一贯埋头业务、但在现实教育下迅速跟上形势、强烈追求进步的老教授王鸿宾等各种类型的人物,也都给人们留下一定的印象。尽管小说的有些笔墨不免稍嫌肤浅,个别地方尚流于概念,但从总体来看,无论在细节的真实性,还是在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方面,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国革命青年,从五四运动时开始,就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长时期以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广大知识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三〇年夏,由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

党领导下的各种左翼团体和爱国青年组织一度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曾趋于低潮，但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炮响，震醒了爱国的各阶层人民，激起了全国青年爱国运动的高涨。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所谓“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竭力阻止爱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革命青年怒不可遏，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十万名大中学生举行罢课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九月二十八日，南京学生和上海学生赴宁代表奋起捣毁了拒不支持人民抗日要求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但就在当晚，上海的七千多名学生代表却被反动政府用专车押回上海。十一月份，更大规模的学生请愿队伍，经过艰苦奋斗又来到了南京，可是，蒋介石卖国政府却用血腥屠杀回答了爱国青年的正义要求。十二月十七日，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三万多名学生代表，一举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其“国民政府”，并再次捣毁了卖国投降的外交部。对侵略者奴颜婢膝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非但不顾革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且竟指挥军警吹起冲锋号，向赤手空拳的学生队伍冲击。当场不少爱国青年负伤、牺牲，被捕的更不计其数。第二天，反动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学生住处，把要求政府抗日的各地爱国青年押上火车。然而，人民要求抗日的正义斗争，并未因反动派的蛮横镇压而有丝毫退却，斗争更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展开。

小说从“九·一八”的一声炮响开始展示作品一系列人物的主要活动。这时，具有爱国正义感的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个人坎坷境遇所形成的彷徨状态中惊醒过来，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接着，小说更着力描叙了北京大学学生南下示威团在南京所进行的示威请愿活动，从而层次分明地表现了广大爱国青年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

下蓬勃开展；从一个侧面，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爱国青年奋起抗敌，并同国民党卖国政府开展不屈斗争的生动情景。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正如小说通过对戴愉形象的刻画所展示的那样，由于党内在这一时期所形成和发展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某些领导者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过分夸大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因全国抗日反蒋风暴的掀起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种种冒险主义的主张与行动纲领，否认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必要性，使苏区几年来工农红军艰苦战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的有利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小说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卢嘉川、江华、林红、刘亦丰等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活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时，蒋介石卖国集团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拉拢了汪精卫以及其它反革命势力，重新稳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并集中力量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紧接着，又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对红色根据地的第五次围攻。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领导以后，才扭转了革命形势，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当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华北领土时，中国共产党及时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问题，提出了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京，声称南京政府若不接

受日本要求，将采取“自由行动”。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同日本帝国主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一个协定（即所谓“何梅协定”），决定取消河北省与北平、天津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扎在河北省的一切中国军队；撤换冀察两省的省主席以及北平、天津市长等等。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已丧失殆尽。

这年的十月份，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十一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使河北东部二十二个县“特殊化”，并纠合汉奸李守信等在内蒙古组织所谓“内蒙自治政府”。同时，国民党政府又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全国各阶层爱国人民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到处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当时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一切愿意抗日救亡的人们，同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及其它抗日军队一道，并肩作战，统一行动。当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到达陕北以后，又进一步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抗日反蒋，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在中共中央号召与组织下，北京一万多名大中学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大示威。群

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政府妥协外交”等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爱国救亡的基本条件。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宋哲元部队消防水龙与大刀的攻击，当场有五百多名学生受伤，但是，爱国青年运动并没有因此被镇压下去，更大规模的斗争在继续酝酿中。

十二月十六日，是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三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在党的领导下手挽手组成四路游行大军，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等口号，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沿途市民也纷纷参加了游行行列。爱国群众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袭击，在前门举行了露天大会，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从早晨三时起一直到夜晚十时，游行示威群众赤手空拳地为挽救危急的祖国整整搏斗了一天。在群众运动的威力逼迫下，汉奸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告延期开张。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爱国群众革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响应。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成了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北平、天津学生组织了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对农民作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这个组织就遍及全国。接着，全国各地人民又先后组织了各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五月，还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至此，抗日救国已不仅是少数先进爱国人士的倡导和愿望，而成了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和行动。新的革命浪潮从此在全国范围高涨起来。小说就在“一二·一六”的游行队伍奋勇前进的宏伟画面里结束了一系列人物的活动。

综上所述，《青春之歌》以北京地区三十年代爱国学生运

动为主要线索，深入地反映了在这大动荡的年代中各种类型知识分子的面貌及其变化，胜利地完成了生动展示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青年运动，以及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革命青年茁壮成长的艺术使命，以高昂的革命激情，谱写了一曲革命青年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献身壮丽事业的感人至深的“青春之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却被“四人帮”及其爪牙斥之为“毒草”。“四人帮”一伙所以要如此仇视这部小说，固然由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三十年代本就是比小说里的戴愉还要“戴愉”的可耻叛徒、特务，本就是比白莉苹还要“白莉苹”的醉生梦死之徒，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小说所生动描述的群众爱国斗争，所热烈赞颂的党对革命青年的指引、教诲，乃至小说所遵循的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他们一伙所深恶痛绝，同他们一伙的反革命要求、愿望与主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联系三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斗争背景，便不难了解“四人帮”必欲置《青春之歌》于死地的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

从一定的历史范围看小说反映的生活

文艺作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评析与鉴赏文艺作品总是首先从一定时期社会生活出发，考察作品反映得是否真实，是否深刻，是否达到典型化的要求，从而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其他方面的成就与特色。因此，当我们接触一部作品时，总往往先要弄清它反映的是哪一时期、哪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作品所反映的有关生活与斗争内容，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思索。比方说，关于作

品所反映的中心事件,对照一定时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不仅应该是当时可能发生的,而且还应该在某一角度、某种程度上展现这一特定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人们常说的“借一斑以窥全豹”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文艺作品展示的仅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很小的一个侧面或片断,但必须借此“一斑”能帮助人们生动地看到“全豹”的某些方面的本质面貌。列宁在评价俄罗斯作家列甫·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时,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七六页)倘若不首先弄清作品反映的历史内容,便失去了评价作者付出的艺术劳动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依据。因此,阅读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不仅从社会功能上讲,两者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了解过去,即使在认识生活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往往能相辅相成,起互相配合的作用。通过文艺作品,人们可以从生动地形象地认识一定的历史;阅读史书,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是否反映出一定时期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成功的文艺作品帮助人们了解一定的历史背景,并非在形象描绘这一主要手段之外,依靠大量的外加的抽象介绍,而往往就在作品人物思想言行的展示过程中,让人们既了解到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又提供人们具体考察作品是否反映出一定时期社会生活本质的主要依据。比如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喜爱什么,憎恶什么,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关系到作品是否能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本质,关系到是否能将个性鲜明的人物思想言行的展示,同表现促使人物行动的环境共同达到典型化

的要求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作品人物思想言行的描述,既要再现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又通过人物的典型化,充分地揭示一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概貌。

小说《青春之歌》的成就正是这样。作品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以及各种类型知识青年,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运动形成高潮这一历史时期的种种活动,生动地反映了三十年代知识青年的历史动向,展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没落在广大爱国青年中的强烈反响,揭示了两个阶级及其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对于青年一代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争夺的情况。由于对林道静以及其他知识青年的思想性格,乃至对王鸿宾、王彦文、余敬唐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言论行动,作者历史地、具体地展示了他们身上所打着的阶级烙印与历史烙印,小说虽没有专门介绍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概况,但生动形象地从某些侧面,向人们提供了领略作品人物活动的特定时代的阶级力量对比与阶级斗争发展趋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三十年代是最腐朽的社会力量。他们卖国求荣、媚敌投降,竭力想镇压广大革命人民的抗日正义要求,他们在思想理论、学术研究领域也妄想腐蚀人们的革命斗志,企图找寻与培植其接班人;然而,他们的皮鞭、大刀吓不了广大爱国人民,他们的“读书救国”等谬论骗不了绝大多数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虽然他们政权在握,广大爱国志士们仅是赤手空拳,低估其镇压人民的力量是显然错误的,然而反动派的其势汹汹,却阻挡不了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不仅林道静、许宁、王晓燕、李槐英、崔秀玉、俞淑秀等一大批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茁壮成长,不仅广大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通过麦收抢割的前哨战已渐趋尖锐激烈,而且连长期自命为超脱于政治的王鸿宾

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大踏步跨上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前列。反对侵略，反对霸权，成为人心所向的必然历史要求；镇压群众运动、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一定要受到时代的惩罚，这也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小说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两个阶级在特定形势下的对垒，显示了历史长河所反复证明了的生活真理。

将小说展现的有关生活内容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中来考察，才能了解作品中人物思想言行作为一定时代产物所反映的深度与广度。倘若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评论作品人物言论行动的是非，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往往可能用现在的标准苛求过去时代的人物，或降低要求，一味强调时代的差异，这样都不能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比如，小说《青春之歌》关于林道静等众多知识青年恋爱生活的描写，就“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来讲，确有一定的生活依据。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刚从封建桎梏束缚下挣脱出来的知识青年，较多地考虑与争取男女间婚姻恋爱的自由，并以此作为谋求民主、解放的具体内容之一，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般知识青年以及一部分贫苦市民中，不履行法律手续、不公开举行婚礼便实行同居，是较为常见的，如果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来考察，也无可非议。历史地看待并基本肯定有关生活内容的描写，并不等于认为今天也应该如此对待生活。

有人曾提出疑问，林道静倘用今天眼光看来，并没有多大进步意义，为何小说《青春之歌》要以这样的人物作主人公呢？要知道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相隔四五十年，先进的标志与要求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也是丰富复杂的，文艺工作者总是选取自己所熟悉和深有感触的人物与事件，进行艺术再创造的劳动。不仅文艺

的题材、体裁、风格等等应该多样化，在以什么样的具体人物作主人公的问题上，作者也完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处理。它既可以是较成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也可以是成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或其他各种类型的人物，这和不同作品的题材、主题，以及作者的艺术个性与独特风格有关，也和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有重要的联系。不论以什么样的人物作主人公，只要作品能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展示一定的时代面貌，对读者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具有积极意义，便都应该得到肯定。象林道静这样的青年，如今虽然谈不上具有多么突出的进步意义，然而在三十年代，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她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她所迈出的前进脚步，却能反映当时一代青年的本质与主流。《青春之歌》既然是一部反映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斗争中成长的小说，那么确定林道静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不仅有助于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爱国青年运动的面貌，而且这一在早期存在较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情调的人物形象本身，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也仍然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小说并没有赞赏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情绪，而恰恰是以否定的态度描写有关人物在接受党的教育与影响前的种种弱点与缺点，作品所赞颂的只是主人公强烈要求进步、勇于否定自身弱点、认真改正缺点错误的方面。倘若我们能紧紧扣住三十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注意从作者选取提炼的题材、主题和赋予作品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等具体条件出发，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便能对作品人物的思想言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便能从中汲取历史的教益，而不致象个别读者那样去作机械模仿，比如效仿她在接受革命影响前的某些言论、行动，甚至服饰、打扮等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需要，大搞法西斯文化专